

醫療想像與性別矛盾*

——探究《袋鼠男人》中男性懷孕的多元議題

李欣倫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李黎表示，1992年出版的《袋鼠男人》是她寫作的「異數」，然就目前研究來看，《袋鼠男人》多作為李黎其餘文本的參照，缺乏深入論析，即使探討，也多快速得出男性懷孕能達至性別平權、成為女性救贖的結論。因此，本文欲從小說中的角色塑造和細節經營，指出借助醫療科技讓男性懷孕，反而暴露更多性別偏見與矛盾，女性更是如此。比起性別議題，李黎更強化了孕體的去性化和孤立性，男性懷孕期間的瘋狂行徑，打破了大眾對於懷孕乃身處恬靜「靈光」之想像，由此反思懷孕狀態和醫療環境，以及描述女醫在男醫主導的婦產科裡的處境。女醫喬伊絲的堅毅形象打動了導演劉怡明，成為她將此小說拍成電影的動機，然而，在強調娛樂性的影視文本中，不僅女醫的角色較難發揮，劇本細節似有強化性別刻板印象。最後，因《袋鼠男人》寫作計畫的中斷和接續，皆和李黎兒子意外亡故有關，因此本文也參照《悲懷書簡》和《晴天筆記》的部分內容，欲指出：比起這兩本悼念亡兒的散文，《袋鼠男人》更具改寫敘事力，由此可見過去深信醫療科技的李黎對醫療侷限、生死終始的反思。

關鍵詞：李黎、《袋鼠男人》、女醫師、醫療想像、性別矛盾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醫療想像與性別矛盾：探究《袋鼠男人》中男性懷孕的多元議題」（112-2410-H-008-070-）研究成果，特別感謝學報審查委員的指正與建議。

Medical Imagination and Gender Contradictions:

An Exploration of the Diverse Issues of Male Pregnancy in
The Kangaroo Man

Li Hsin-Lu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Li Li describes *Kangaroo Man*, published in 1992, as an “anomaly” in her writing.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is novel is primarily referenced in relation to the rest of Li Li’s works, and lacks in-depth analysis. Some scholars have examined the issue of male pregnancy, and most are quick to conclude that male pregnancy can lead to gender equality and become the salvation of women.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portrayal in the novel of medical technology enabling men to get pregnant actually exposes deeper gender biases and contradiction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women. Beyond the issue of gender, Li Li reinforces the alienation and isolation experienced by the pregnant individual. Through the erratic behaviors of male characters during pregnancy, Li Li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perceptions of pregnancy as a tranquil “aura”. This critique extends to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describing the experiences of female doctors in the male-dominated fields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he determination of Joyce, the female doctor, inspired director Lau Yee-ming to adapt the novel into a film. However, the cinematic version emphasizes entertainment; this complicates the portrayal of the female doctor’s role as the script reinforces gender stereotypes.

Furthermore, the interrup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writing project of *Kangaroo Man* are related to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Li Li's son. Hence, this article also draws connections to her other works, *Grief and Memory* and *Sunny Day Notes*, suggesting that *Kangaroo Man* contains more rewriting and narration than these two texts that commemorate her deceased son, thus reflecting the author's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limitations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the realities of life and death, despite her past deep faith in medical science.

Keywords: Li Li, *Kangaroo Man*, Male Pregnancy, Medical Imagination, Gender Contradictions





醫療想像與性別矛盾

——探究《袋鼠男人》中男性懷孕的多元議題

一、前言：《袋鼠男人》作為缺乏論述的「異數」

九〇年代，幾位台灣女作家以小說和散文，書寫成為母親及育兒教養的經驗，例如朱天心、張讓、李黎和簡嬪等，朱天心在〈袋鼠族物語〉中，以獸類比喻母子，細寫原是都會時尚女郎的母親，如何因成為母親而開啟原始的穴居生活，彰顯母親身分的轉換對女性實屬艱難；張讓則在 1992 年到 1994 年間，於報刊陸續發表「親子沉思」系列散文，探究為何選擇成為母親、文學中的母親形象、母職掙扎及社會建構的母親神話。¹ 李黎於 1996 年出版《晴天筆記》，以短文記錄與幼兒相處的生活點滴，簡嬪則於 1999 年出版《紅嬰仔》，試圖從基因、醫療等角度，全面探研究生養議題，回應她認為當時社會女性的婚姻與家庭仍屬「女性學荒漠」之景況。²

《紅嬰仔》「密語之五」從人類演化進程，思索育兒工作為何落在女人身上？「與其把衍育工程交給到處闖禍的男人，倒不如交給較細心、耐心、愛心的女人穩當」，然簡嬪也隨即辯證：「我們」女人可能會認為將育兒工作交給女性是陰謀，由此女性便失去征戰能力，「若倒回遠古太初，將衍育之事交給男性，他們也會乖乖學習這些技巧，並視之為『天經地義』的。」³ 較諸於育兒工作落在女

1 「親子沉思」系列散文包括五篇作品，分別是〈初生〉、〈永恆的邊緣〉、〈界定之外：母親的象徵與實際〉、〈這一個小傢伙〉、〈親子沉思〉，後收錄於《斷水的人》（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03）。張讓「親子沉思」及九〇年代台灣女作家關於母親、母職議題的探究，可參考李欣倫，〈神話之外的真實女人：《斷水的人》中的母親形象反思與辯證〉，《中國現代文學》44 期（2023.12），頁 29-50。

2 簡嬪，《紅嬰仔：一個女人與她的育嬰史》（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05），頁 26。

3 同註 2，頁 45。

性身上的陰謀論，Nancy J. Chodorow 綜合生物演化論、生理學、心理學等各家觀點來看「母性本能」，她提出母職「是性別分工的基礎構成因素」，也就是女人專司母職其實出於父權社會結構所建構，「只是強化和維繫了女人權力不張的現狀。」⁴先不論照顧嬰幼兒的母職或親職（parenting），Nancy 在批評生物演化論認為女人具有母愛本能之餘，倒是肯定其中的部分觀點，即在採集、狩獵且嬰兒死亡率高的年代，女性持續生子有助於團體維繫命脈，若讓這些戰鬥力可能更勝於男性的女人去打獵，無助於整體利益，因為男人肯定無法懷孕生子或撫育小孩，畢竟唯有女人方能受孕生子，這是至今無可推翻的事實。蘿拉·吉普尼斯（Laura Kipnis）在〈母性本能〉中，指出男女性不平等的來源即在於生育功能，而生子懷孕又野蠻，「除非人類能發明、運用某種科技手段，否則，女性永遠得不到平等的社會權益，因為兩性間必須承擔生養痛苦的一方，只能是我們女性」，並說若強迫男性接受懷孕生產的折磨，傳說中的「科技手段」早就發明出來了。⁵可見借助於科技手段讓男性懷孕生產，也是女性主義者期盼達成男女平權的奇想。

在簡媜以演化學脈絡辯證「比起託付男性，生育大事交給女性較穩當」的觀點之前，李黎於 1992 年的長篇小說《袋鼠男人》便以這樣的奇想出發：倘若將懷孕的苦差事交給男性，會發生什麼事？李黎曾說明此一奇想來自於從事生殖生物學研究的丈夫薛人望，薛氏認為男性懷孕生子在科學理論上完全可行，也表示他曾構思名為「The Kangaroo Man」的小說，紐約的出版社人員表示相當有興趣，「她們（湊巧也都是女性）認為書中男女角色的對換很是獨特，對外行人了解生物醫學也會有幫助，懷孕的婦女手中有一冊，不但讀來有趣而且可以增長懷孕過程的知識。」⁶由此可知，當初的構想是藉有趣的說故事方式，出版給懷孕

4 Nancy J. Chodorow 著，張君玖譯，《母職的再生產：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3.10），頁 39。

5 Laura Kipnis（蘿拉·吉普尼斯）著，于昶譯，〈母性本能〉，Meghan Daum（梅根·達姆）編，《為什麼我們不想生：生與不生，哪一種人生選擇更幸福？》（台北：二十張出版，2022.12），頁 43-44。

6 薛人望，〈李黎與「袋鼠男人」〉，《聯合文學》8 卷 5 期（1992.03），頁 111。

婦女閱讀的手冊，這正是新手媽媽簡楨在《紅嬰仔》中表達的期待：九〇年代中後期成為母親的她，亟需一本《懷孕百科》和《育嬰全書》之類的實用手冊，解決諸種生養的疑難雜症。不過，李黎看來並不滿足於介紹性質的實用手冊，也不像張讓以議論散文探究母親的真實感受與文化建構，更不將焦點放在〈袋鼠族物語〉小說中的母職勞動，比起成為母親「之後」的關照，她更有興趣也更具顛覆性的其實是成為母親「之前」的奇想：「如果讓男性懷孕會怎麼樣？」其次，她也關心如何將這個奇想文字化、故事化：「既然當前還沒有作這種『實驗』的需要和社會條件（雖然技術上完全可行的），何不將之行諸文字？因為在這個奇妙的念頭後面，有一個呼之欲出、耐人尋味的故事」。⁷ 這個觀點也符合多家出版社給薛人望的回饋：故事構想佳，但需要一位作家重頭寫起，妻子李黎應是首選。

但薛人望表示，李黎原先對這本書不感興趣，之後經歷了喪子的打擊；以及想再次懷孕遭受的身心折磨後，反而對這個故事重燃希望。李黎也表示，《袋鼠男人》和她在九〇年代前後經歷的「生命中最大的失落」有關，書寫摯兒死亡的散文《悲懷書簡》於1990年出版，《袋鼠男人》則在同年有了雛形，因此寫長子亡故的散文和虛構男人懷孕的小說之間似乎存在關聯，對此薛人望直言《悲懷書簡》是李黎治療自身的藥方，而《袋鼠男人》中的不孕夫妻邁可與珍妮對新生命的渴求，也對他倆產生新的意義。不僅如此，當時身為史丹佛醫學院生殖醫學教授、美國卵巢協會主持人的薛人望，正研發能協助不孕婦女的助孕激素，因此薛人望對《袋鼠男人》的評價是：「這本書將懷孕的可能推至極限。」⁸ 將懷孕的可能推到極限，似乎也滿足了上述女性主義者的終極願望：利用醫學技術讓男人懷孕生產，而李黎則認為「有哪個男女平等的構想推到這樣的終極——讓男人懷孕生子？」⁹

然而，「將懷孕的可能推至極限」的《袋鼠男人》，卻是李黎研究中較少被

7 李黎，〈「袋子是假的，袋子裡的東西是真的」〉，《袋鼠男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2.03），頁1。

8 同註7，頁111、112。

9 李黎、劉怡明，《袋鼠男人：電影劇本與幕後人語》（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4.12），頁16。

探論的作品。以李黎為主題的小說研究，多以她七、八〇年代的《西江月》為主，散文研究則以九〇年代的母職散文、旅行書寫為主。小說研究以奚密為代表，奚密分析李黎筆下的角色多為成熟的知識分子，這些男性菁英常「痛苦地意識到自我個體的衝突與對立，但又無力改變現狀。」¹⁰ 傳統故鄉與美國文化的扞格，導致外在自我和內在自我的雙向分裂。奚密的論述成為接下來研究李黎八〇年代小說的重要參考文獻，多數論文不脫奚密的救贖論。¹¹ 再者，李黎九〇年代後的散文，因以母職、喪兒、旅行為主題，散文研究也以此為關鍵詞展開論述。¹² 有趣的是，李黎的小說研究中，少見《袋鼠男人》之專論，母親的議題也多半出現於散文研究中，兩者鮮少有交集，即使略提《袋鼠男人》，也放在散文《悲懷書簡》和《晴天筆記》的脈絡下，以簡介方式帶過。其中，陳必苓對《袋鼠男人》的評價如下：「完全不見李黎過去掙脫父權、家庭的影子，而是以無比正面的態度書寫邁可願意代替女性懷胎十月」；「邁可自願性的將最原始的生育角色互換，期許男女的家庭地位能夠達到真正的平等與和諧，對女性而言無非是一種最根本的救贖。」¹³ 自奚密 1989 年提出「救贖論」後，「救贖」似已成為解讀李黎小說的

10 奚密，〈自我衝突與救贖意義：李黎小說研究〉，《中外文學》18 卷 5 期（1989.10），頁 48。

11 如陳必苓在〈尋找烏托邦——李黎《西江月》中的集體救贖〉文中，便延續奚密的自我救贖觀，將此擴展為集體救贖。陳必苓，〈尋找烏托邦——李黎《西江月》中的集體救贖〉，《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9 輯（2011.12），頁 63-81。

12 母職書寫如潘雅鈴，〈臺灣自主性母職書寫的多面向——以李黎、龍應台、簡媜為例〉，《南台學報》37 卷 4 期（2012.12），頁 89-103；旅行書寫則如林韻文的〈浮世逆旅：李黎旅行書寫的主題建構與風景鏡像〉，《嘉大中文學報》3 期（2010.03），頁 115-148。除了這兩篇期刊論文，7 本學位論文也多聚焦於母親和旅行議題，列舉如下：熊家艷的〈李黎散文的追憶書寫〉（台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19），從書寫亡子和旅行談追憶特質。蘇婉如的〈流亡與回歸：論李黎和洪素麗的家族書寫〉（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9），從童年、人物、政治認同和文化鄉愁，談李黎、洪素麗家族書寫之異同。陳之婷的〈雨過天晴，生生不息——李黎《晴天筆記》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探討李黎透過育嬰紀錄思考母親角色，將喪子悲懷轉為撫育新生的力量，藉書寫獲得治療可能。潘純菁的〈李黎旅行散文研究〉（台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10），從散文敘事的音樂性、繪畫性，細剖李黎的旅遊散文。侯俐雅的〈李黎小說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探討小說人物的自我衝突、救贖、性別新思維和敘事風格。李麗芬〈在《浮生》中尋找——李黎散文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以李黎 1990 年到 2000 年間出版的 6 本散文集為主，探討文本中的母職、母性體現和旅遊書寫。

13 同註 11，頁 67。

關鍵詞，連探討性別議題皆可套用。然細讀《袋鼠男人》，整體衡量角色間的對話、關係，乃至放在整體的醫療環境和社會語境，筆者以為這種快速跳到結論的「救贖觀」缺乏辯證，也忽略了文本細節的暗示。因此，本文想探究的議題是：是否因男性懷孕的安排，便能推導出家庭達致「真正的平等與和諧」？成為女性「最根本的救贖」？是否藉科技手段讓男性懷孕，便能達成男女平權的終極理想？若從小說中的情節和細節來看，是否真的如此？皆值得進一步探究。

李黎表示《袋鼠男人》是她寫作的「異數」，從前行研究看來，此書若非其餘散文的配角、作為悼念亡兒和母職書寫的輔助文本，就是被繞過的文本，不僅如此，這本小說恐怕也是九〇年代女性小說家探討性別議題的異數。回顧《袋鼠男人》出版的1992年前後，過去戒嚴時期被壓抑的女性聲音浮現，接續八〇年代女作家在兩大報文學獎扮演的關鍵性角色，解嚴後的九〇年代，女作家以性和身體的解放為前導，相關書寫實踐勃發，不僅如此，「女作家衝破過往威權政治的缺口，逼視政治與性別禁忌」。¹⁴ 九〇年代常被探究的台灣女小說家為李昂、平路、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蘇偉貞、施叔青等，學者以女性、歷史、時間、家國、性別等關鍵詞切入，深度論述這幾位女作家的小說及其時代意義，¹⁵ 若放在這些女作家的小說中，《袋鼠男人》也堪稱其中的「異數」——其中既沒有深度建構台灣歷史與性別議題交織的意圖，也沒有從女性角度看母職勞動與母親形象，可能因為《袋鼠男人》闡述懷孕男性的緣故，看來偏離現實，過於科幻。然

14 王鈺婷，〈穿越百年的性別平權史詩〉，王鈺婷主編，《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10），頁30。

15 這裡列出的幾位女作家，乃參考下列幾位台灣學者的研究，列出其中討論度較高的女作家，參考的研究包括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7.09）；范銘如，〈由愛出走——八、九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03），頁151-188；邱貴芬的〈女性的「鄉土想像」——台灣當代鄉土女性小說初探〉、梅家玲的〈「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梅家玲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10），頁119-143、頁173-208；林芳玫的〈《迷園》解析——性別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弔詭〉，鍾慧玲主編，《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台北：里仁書局，1997.04），頁271-296等研究資料。

而，李黎又解釋這並非科幻小說，¹⁶ 不像平路九〇年代的〈人工智慧手記〉中男性科學家創造女機器人的科幻敘事，也不全然從女性為主體出發的小說，《袋鼠男人》以男性懷孕而延伸出性別平權的期待，卻折射出醫療想像更加凸顯出的性別矛盾，而性別矛盾又展現了作者對懷孕狀態和醫療環境的思考。

是故，本文從醫療想像與性別矛盾兩個層面出發，聚焦於李黎稱為「異數」的《袋鼠男人》，從性別身分、親職分工、懷孕身體感、孕體的去性化和孤立性、女醫處境等角度，試圖探究以下問題：在男性懷孕應是女性福音的前題下，小說的主要角色邁可和珍妮卻在性別認知與上採取了曖昧、猶疑的直觀態度，甚至暴露其性別矛盾與刻板印象，尤其是女性更加如此，兩者之間的反差透露了什麼訊息？又即使暴露了珍妮的性別矛盾，李黎也藉由珍妮視角，反思婦產科的醫療環境，並透過喬伊絲之形象塑造，讓讀者從她的觀點理解女醫處境。女醫喬伊絲的形象，也成為吸引導演劉怡明拍攝《袋鼠男人》的原因之一，她從醫療環境中的女醫比例，感受到同為男性主導的影視產業中，身為女導演的困境。不過這種同理心，在著重市場娛樂性的產業中，不但無法充分發揮，也詭異地強化了性別偏見，展現了性別議題的錯綜複雜。論文最末，則將《袋鼠男人》放回李黎九〇年代的寫作脈絡中探究，據李黎的說法，這本小說的中斷和重新接續創作，皆和兒子猝死有關，因此本文參酌《悲懷書簡》和《晴天筆記》中的生死懷思和醫療反思，不同於過去研究以散文為主、小說為輔的傾向；以及強調《悲懷書簡》的書寫療癒性，本文試圖指出《袋鼠男人》可能更具備改寫的敘事力。

二、「閹割」恐懼與孕體孤立：男性懷孕的議題

《袋鼠男人》開頭描述子宮外孕的珍妮，在婦產科醫師喬伊絲·唐寧急救下，

16 薛人望解釋，利用男性自體皮膚繁殖製成「袋子」；再將「袋子」縫入男性體內，完全符合科學理論。李黎在《袋鼠男人》序文也提及，她認為比起科幻小說，《袋鼠男人》是具備科學依據的「科學小說」。李黎，〈「袋子是假的，袋子裡的東西是真的」〉，《袋鼠男人》，頁1。本文多處引用《袋鼠男人》，故以下引文於文末直接標明書名及頁碼，不另加註。

為保住孕婦性命，不得不拿掉珍妮的子宮。仍想擁有自己孩子的珍妮和丈夫邁可·李，先寄望於代理孕母，但完成取卵技術後，代理孕母竟捲款潛逃。身為生殖醫學家，邁可突發奇想，根據「縫袋子」的理論，親身實踐男性懷孕。說服珍妮後，進一步以偉大的科學研究和利益不孕婦女為名，邀請喬伊絲參與執行手術，及鑑定胚胎性別的專家戴維·霍布思，共組「袋鼠男人」實驗團隊。男性懷孕，乍看能滿足部分女性對男女平等的期盼，但在李黎筆下，反倒強化更多性別刻板印象。以下兩小節探究男性懷孕所暴露出的性別矛盾，及小說家對孕體狀態的反思。

（一）性別平權或性別偏見？

邁可懷孕前，一次與珍妮的對話便流露了潛在的性別偏見。當兩人面試代理孕母，候選人之一的范代克太太「看起來品貌端正」，珍妮直覺對方是個可靠的女人，但邁可反對，因范代克太太身材高大、虎背熊腰，「根本不像個女人」，當珍妮替范代克太太說話，邁可強調她唇上的鬍鬚渣，這代表范代克太太具有旺盛的雄性賀爾蒙，若生下小鬍子女嬰該如何是好？他對范生太太的總結是：「簡直是一位范代克先生男扮女裝的！」¹⁷並特寫了珍妮和邁可夫妻倆注視范生太太的男性性徵：骨骼粗大的手、肩膀肌肉、手臂上的毛茸茸汗毛，甚至當邁可盯看對方的鬍渣、喉結之際，還摸了自己的喉結，趣味性地表徵兩人同性別。這個「她不像女人」的說詞出於生殖學家之口，也帶讀者反思，那麼「何謂女人」？更精準地說，是「何謂母親」——除了「不像女人的」范代克太太，在邁可眼中嗑藥般的年輕女子、嚴格素食主義者皆屬負面樣板而遭淘汰。

篩選保母的過程也極富政治性，折射出社會對於理想母親的典型，這可從最後勝出者邱吉蘭的特質窺之：二十多歲、白人女性、金髮、舉止與談吐合宜、身材適中、著套裝……邁可立即被眼前的孕母典型吸引，當她解釋急需負擔法學院

17 電影劇本裡，范生太太（范代克太太在劇本中為「范生太太」）直接由男性飾演，劇本形容「她」「虎背熊腰，非常有男子氣概。」李黎、劉怡明，《袋鼠男人：電影劇本與幕後人語》，頁32。

的學費才來應徵，邁可立刻認定對方是律師人才。邱小姐的條件濃縮了婚姻市場中的最佳女主角，在高知識分子邁可眼中，正適合作為孕母，其中也暗示了社會宗族對年輕女性在傳宗接代的優生學期待。但後來才發現邱吉蘭捲款潛逃，詐欺行為反映了典型破滅，更深層折射出「完美」的母親往往出自於一般人的理想投射。另外，從敘事角度來看，這意外插曲也有其必要，這麼一來，方能導出小說的主要情節：尋找孕母未果，又顧慮冷凍卵子期限，邁可決定借助科技讓自己受孕。

當珍妮從邁可口中得知袋鼠男人計畫時，除了震驚，還有強烈敵意。以下這段夫妻爭辯值得玩味：

「這有什麼不對？剛才在餐館裡妳和喬伊絲不是都贊成男人也該嚐嚐生育的滋味嗎？後天的性別分工固然是男女不平等的象徵和結果，如果連先天的性別分工都可以打破，那還有什麼可以阻礙男女平等呢？現在女人都在做許多傳統觀念認為是只有男人才能做的事，那為什麼男人就不能做『只有女人才能做的事？』誰也不要再有特權不是最好嗎？」

珍妮怒氣稍平，但仍有些忿忿地說：「男人也生育，那豈不是對女性的一種閹割？」

「請妳聽清楚，我也要生小孩並不是就不准妳生或者不准天下女人生，這怎麼稱得上是『閹割女性』？何況妳想想，我在懷孕期間必須放棄自己的男性性徵，我都還沒抱怨這個『閹割』的問題呢！」

「好，就算這個『男女平等』的題目你說贏了，那麼我們來談你本身的問題吧！首先就是這個『閹割』問題：我的丈夫是個男人啊，這下懷孕做女人，我又不是女同性戀，我怎麼受得了？」珍妮看著英俊的丈夫，不敢想像他變成女人是什麼樣子。（《袋鼠男人》，頁 79-80）

珍妮和喬伊絲雖擅長從日常生活中辨識出性別偏見，然提到懷孕、生產專屬女性

的「特權」，珍妮認為這是對女性的「閹割」。「閹割說」在此並沒有被精準使用，但若從小說開端描述她的子宮被切除，「閹割」兩字又變得很「切身」，因為她不能再懷孕，讓她覺得「天職」被剝奪，彷彿不再是女人。相反地，珍妮不安地認為施打女性賀爾蒙的丈夫若順利懷孕，在母性被對方取代的同時，也交雜著混亂性別觀：身為女性賀爾蒙發達的邁可伴侶，自己豈不成了「女同性戀」？「閹割說」透露了母性被取代和剝奪的恐懼，換言之，懷孕不僅是從生物性來定義女性，甚至可能成為檢視女性是否「完整」的標準，成為社會對女性的（扭曲）定義，因此珍妮的「閹割說」隱藏著雙重被剝奪感，身體上指向她失去子宮的事實，精神上則顯示「女性 = 母性」的自我認同感褫奪。更荒謬的是，珍妮將施打女性賀爾蒙的邁可視為「女性」，因此才會有「女同性戀說」此一奇詭之說。細剖珍妮的說法，雖然施打女性賀爾蒙，但邁可仍能對女性產生蓬勃慾望，因此珍妮將自己視為「女同性戀者」，乃混淆了生理性別、性慾和性別認同三者，不過，珍妮的混淆也拋出了另一個問題：施打女性賀爾蒙用以增加雌性激素的邁可，還稱得上是生理男性嗎？他是丈夫嗎？或該稱為「妻子」？邁可懷孕後，李黎鋪陳更多性別混淆的情節。

例如當邁可提到懷孕體型改變對女性是極大犧牲，珍妮則回應她曾製作節目，讓青少年穿戴重達三四十磅的孕婦裝，體驗懷孕艱難，邁可便慫恿珍妮去體驗，珍妮不僅嬉笑婉拒，還以動物界為例，解釋雌的負責產卵，雄的負責受精和孵育。這段對話雖讓小說具娛樂效果，但也曖昧顯示了男女角色置換後，反倒落入了刻板印象：即使珍妮曾製作同理孕婦身心壓迫的節目，卻無法體會身旁的孕夫，甚至還用動物界中的雌雄分工為喻，這顯然略為失當——產卵、受精、孵育既不符合人類孕育的過程；況且懷孕由邁可承擔，「雄」的珍妮並未分擔其中工作——充其量只看出珍妮想逃避免教育意義的孕婦體驗。此外，珍妮舉動物界為喻，似乎也混淆了人與獸的差異，男女成為雄雌，丈夫和妻子似乎成了失落的社會身分，然而，邁可在此之前已將自己比擬成袋鼠和海馬——母海馬將卵產在雄海馬腹中的孵卵囊，兩到三週孵育後由雄海馬產下小海馬——無論袋鼠還是海

馬，皆隱喻了懷孕從人滾動到「非人」和獸類的狀態，這也與其他台灣女作家如張讓、周芬伶描述懷孕的狀態一致。¹⁸

因此，施打女性賀爾蒙的孕「夫」是丈夫還是妻子？李黎僅拋出問題而無解答，但從女同性戀、袋鼠和海馬等形容，一再顯示了這件分擔女性痛苦的壯舉，其實挑戰了我們對於傳統性別分類（是男或是女）的認知，透過討論男性是否該代女性懷孕的描述，李黎特寫了珍妮混亂而矛盾的性別觀點，甚至接下來在面對孕體狀態時，更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接著，本文欲探究小說中李黎如何透過對孕體孤立的描寫，進一步帶領讀者反思超越性別的孕體狀態。

（二）孕體的去性化與孤立感

孕體的孤立感首先表現於胎動，當邁可初次感受到胎動而興奮與妻子分享，卻發現珍妮如局外人無感。接著，孤立感隨著情節推進而一再被強化，主要表現在產檢過程中的被動與無助：

檢查枱又短又窄，他（邁可）躺在上面一動也不敢動，以免從旁滑下去。兩條長腿懸著沒處放，只好乖乖抬起來擱上枱子末端的那兩根豎起來的擱腳架。這個姿勢令他覺得幾乎是一種羞辱，他不禁想到每一個女人都是這樣被她們的婦產科醫生檢查的，而她們的醫生往往是個陌生男人，而且很可能是個冷淡又傲慢的傢伙。這些女性是怎樣忍受這種難堪的經驗的呢？（《袋鼠男人》，頁 138）

上述經驗多少濃縮了李黎和不少女性的經驗，包括狹窄的檢查台、撐開生殖器的

18 張讓形容懷孕期間機械式的吃喝，如同豬牛，並觀察到自身「非人」的質素：「屬於野獸、無知、黑暗」。張讓，《斷水的人》，頁 102。周芬伶則形容生產過程「高高擎起的雙腿和巨腹，令人想到刀俎上的雞鴨。」周芬伶著，〈汝身〉，陳義芝主編，《新世紀散文家：周芬伶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公司，2002.07），頁 278。

擱腳架，以及正對著陌生男醫的窘迫不適。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就曾指出，女人的懷孕、生育經驗往往被異化，醫療器械以貶低女人內在經驗的方式，將這些過程客體化。¹⁹ 更進一步，她認為醫師藉由儀器對懷孕和生產知識享有控制權，因此貶低了孕婦與胎兒間的特許關係，「在當代脈絡中婦產科醫師通常是男人的事實，降低了醫病間出現身體同理心的可能性。」²⁰ 孕婦與男醫的模式在《袋鼠男人》中，轉換成孕夫與女醫，甚至讓邁可的同事喬伊絲來檢查生殖器，裸露的男性性器讓喬伊絲想起曾對邁可性幻想，最後只能以醫療術語去感受化，將對方視為病人而非男人，才能跨越心理障礙。有趣的是，醫療行為中的去感受化、將病人視為客體，是醫者不被期待的行為；換言之，醫者被期待不但要看到「病」，更要看到「病」的人。²¹ 但喬伊絲卻在邁可身上投注過多感受，她得用醫療專名來消除性幻想，並用「他已經不算個男人」說服自己。將性別去除的想法，似乎也是婦產科醫療過程中的潛在模式，蘇芊玲以自身經驗和問卷統計，分析婦產科背後潛在的現象：「只有在成為『母親』之後，她才因為『不再是一個女人』而敢於要求被照顧，此時，她被照顧的，與其說是自身，不如說是腹中的胎兒，女體應剋守的貞節及得以將之突破的偉大母愛，在這樣的求診模式中，表露無遺。」²² 喬伊絲不將邁可視為一個男人，與蘇芊玲所謂婦產科的求診模式；即孕婦必須習慣於「不再是一個女人」的認知，方能克服檢查過程中裸露的難堪，皆暗示了孕體被「去性化」（desexualized）的過程，同時也強化孕體的孤立性。因此，當邁可注射腦下垂體激素衍生物後，作者形容他雖不能算得上是個女性，至少也是個「無性人」了。「無性人」也是一般對孕體的假設：一但成為母親，即使尚未分娩，母體所賦予的聖潔感，使她不再性感，與性欲等詞彙產生衝突；同樣地，從產檢女醫喬伊絲眼中，乳房漲大、睪丸萎縮，懷著孩

19 Iris Marion Young（艾莉斯·馬利雍·楊）著，何定照譯，〈懷孕的肉身化：主體性與異化〉，《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商周出版公司，2007.01），頁 93。

20 同註 19，頁 77。

21 張曉風，《曉風散文集》（台北：財團法人道聲出版社，1993.03），頁 377。

22 蘇芊玲，〈女人怕上婦產科〉，《不再模範的母親》（台北：女書文化公司，1996.05），頁 166。

子的邁可也不再是男人，於是，算不上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邁可成了「無性人」。不過事實並非如此，他對男性性徵懷有強大的渴求：當他看到戴維自然地伸出那隻「極男性化的、有著濃密汗毛的大手，在喬伊絲腰上輕輕一扶時」，竟湧現強烈妒意。（《袋鼠男人》，頁 118）

如同艾莉斯所說，孕婦「可能也會發現自己被他人『去性化』（desexualized），她可能也會同時發現自己性慾高漲。」²³ 去性化的想像與性慾高漲的現實之間，更增孕體的孤立性。這個孤立性從小說開端就存在了：小說以珍妮子宮外孕的緊急事故為開端，昏迷中的她甚至無法決定是否要摘除子宮，最後只能靠喬伊絲判斷拿掉子宮以保命。珍妮在小說中的第一次現身，就暗示了孕體的被動和身不由己，詮釋了孕體的全然孤立，她／他的感受、尊嚴和社會文化對她／他的保障，都被擋在隆起的腹部之外。這種社會既定的認知，同時形塑了孕體的孤立感，艾莉斯便認為從古典藝術中，圍繞著母親的「靈光」表現出恬靜感，「主流文化將懷孕投射為一段安靜等待的時光，並稱這樣的女人是『期待的／待產的』（expecting）」，²⁴ 在這段恬靜的待產時光中，無事會發生。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挺著七、八個月肚腹的邁可，無法彎腰綁鞋帶、撿東西、剪腳指甲，加上小腿抽筋、胃被胎兒壓迫而發脹難受，日常小事皆成艱鉅挑戰，疼痛與挫敗感輪番湧現。面對孕者無力抵抗的女性賀爾蒙，邁可只能以「工作療法」緩解，小說解釋醫學對於改善孕婦情緒低落研究，「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法」，再度強化了孕體的孤立性：無論在醫院或家中，受限重重的孕體呈現不被欲求也不受控的狀態。

為了增加戲劇張力，伴隨著被靜置在家的孕夫邁可，珍妮的行動力也隨事業心而逐步增強，當焦躁的邁可需要陪伴，珍妮卻要出差，益發顯露傳統性別角色的詭異對調，演變成女主外、男主內的態勢：珍妮為工作奔忙，邁可則淪為幽怨的深「閨」孕「夫」——雖然孕後的邁可曾因此體會母親、珍妮身為女性單獨在

23 同註 19，頁 89。

24 同註 19，頁 90。

家之感，但同理心倏忽即逝，更多主導的是寂寞——其中的微妙處便在於：懷孕的男性因女性賀爾蒙作用而變成閨怨孕夫，相對地，擁有事業心和自由身的妻子，反倒成為昔日的大丈夫？

不過，小說並沒有沿著深閨怨夫的主軸繼續探究，而是賦予邁可能動性，他先是奪門而出，要陌生孩童將手放在他的腹部上感受胎動；為了解除「閨」「孕」幽怨及滿足嗜酸需求，深夜衝進超市大啖酸黃瓜；最後當戴維、喬伊絲在實驗室作核酸檢定時，邁可深夜潛入實驗室一窺究竟，由此可見邁可突破不可控情緒的方法，竟是在外相上表現出不可控，瘋狂行徑意在破除待產孕婦的「靈光」與不見光，也由此增加敘事張力和娛樂性。李黎讓「男主外」慣習的男性來擔任孕夫，似乎更能強化監禁般的身心孤立感，體內的女性賀爾蒙與男性外貌、社會形象彼此衝撞，最終僅能以逃家來對抗這種反挫力，以強烈的向外驅力，摧毀主流文化形塑的靜態懷孕「靈光」。

因此，李黎筆下的男性懷孕，先暴露了一般人可能有的性別矛盾與刻板印象，後又揭示了孕體身心的全然孤立，這個「無性」、獸性階段難以被體認和理解，共感不易。男女性別角色的對換，並無法讓孕者的伴侶成為體貼的照顧者，反而強化了珍妮「男主外」的動能，深化孕體的孤立感。《袋鼠男人》與其說是女性福音和救贖之舉，不如說此書提供了窺視懷孕狀態的視角，「袋鼠人」所度過的並非眾人投射的恬靜靈光，而是情緒激湧、終於逃家的日常。由此看來，薛人望認為《袋鼠男人》從生殖科技的角度，可以將「懷孕的可能推到極限」，但加入了李黎的人物塑造與情節敘事後，卻與他認為此書「將男女平等願景推向終極」的觀點產生落差，成為他當初以為能成為懷孕指南的反教材。因此，懷孕和生產的過程，並不如薛人望想像的「將袋子縫入子宮」就好，醫療能解決的問題，事實上也對性別、人性的刻板印象帶來挑戰，其中不僅反映出李黎對醫療科技的思索，同時也可見她對女醫處境的觀察。

三、反思婦產科裡的女醫處境

雖然珍妮愈發成為「大丈夫」，但小說中對醫療環境的反思、女醫處境的觀察，也透過珍妮之眼。當珍妮推開「產科·婦科部」大門時，就從繪有三個人的圖案中感受到不平等：「中間高的顯然是男人，兩邊一個穿裙子的當然代表女人、另一個則是小孩……即使在一個專為婦女而設的部門，男人也要擺在中間重要地位。」不僅如此，從這扇需要費力推開的厚重之門，李黎反諷「至少他們認定了婦女也是孔武有力的。」（《袋鼠男人》，頁 63）除了硬體設計忽略婦女的實際需求，珍妮也觀察到美國的婦產科似乎仍是男性天下，在男醫主導的婦科中，珍妮納悶：「男醫師從來不知道經痛、失血、陣痛、分娩、停經等等是什麼滋味，怎能瞭解他們的病人的感覺呢？」（《袋鼠男人》，頁 39）珍妮從邁可身邊幾位男同事得到的印象是：相較於丈夫，女病患甚至更聽從男醫，於是養成他們對女性展現了職業上的君臨之感。

不僅如此，小說中也刻劃了女醫的升遷之途如何因性別而受阻。喬伊絲雖在臨床和研究表現上，皆得到醫療中心多數員工的認可，但主管金斯堡卻忽略她的貢獻——唯一的理由便是她是個女的。喬伊絲無法獲得男性主管認同、順利擔任人工生殖部門主任，回應了女性無法突破職場天花板的現象，這不僅是九〇年代西方女性在職場上所面臨的窘境，台灣的女西醫在升遷上也常受阻，女醫經歷求學、實習到進入醫院，通常也屆高齡，得立刻面臨是否生子的抉擇，受限於此，在職場上也難能創新突破。²⁵ 然而，衝突通常也具備推進敘事之效用：正因喬伊絲升遷受挫而累積不滿，邁可方能在她對體制失望的時刻，以「造福失去子宮的婦女」為由，說服她協助加入「袋鼠男人」團隊。

除了喬伊絲，小說也描述其餘兩位女醫，她們的形象隱含了社會對女醫的偏見。克莉絲汀娜·華倫醫師因金髮碧眼、高大健美，明星般的外型反引來病患家屬質疑，擔心才能與美貌成反比，因此華倫平日刻意掩蓋出眾的外型。另一位東

25 沈靜茹，〈醫師職涯中的性別迷思〉，《台灣醫學》22 卷 4 期（2018.07），頁 419。

方女醫愛麗絲·張，則因個子嬌小被質疑專業能力，直到她站上椅凳、成功完成十二小時的緊急手術後，方贏得眾人信賴，認為不該低估個子小的東方女性——最終袋鼠計畫的緊急手術，也在愛麗絲·張的協助下順利完成。這兩位不同國籍和形象的女醫師，與喬伊絲共同折射出大眾對婦產科女醫的刻板印象。此外，愛麗絲和喬伊絲的外科手術技術有目共睹，甚至喬伊絲常因其縫合技術被稱讚，這點也突破了一般人對女醫選科的想像。不僅西方如此，李黎筆下的女醫處境也在台灣上演，成令方指出醫師選科即具性別意涵，各科別所具的性別形象和陽剛特質，潛在影響了男女醫學生的選擇，女醫通常選擇四大科（內科、外科、婦產科與小兒科）之外的小科，且因負擔照顧家人職責，職場發展也會受限，因此曾有女醫嘆息：「如果我有一個妻子該有多好！」。²⁶ 至於女醫師的外型與專業度間的契合，婦產科女醫林靜儀也在〈「謝謝護士阿姨」〉一文中，陳述女醫師常被錯認為護士，病患也不時質疑女醫的專業：「查某醫師喔？甘有法度？」²⁷ 在病患及家屬眼中，亮麗外型也都引人疑竇，凡是時尚雜誌流行的粉嫩新裝、可愛風髮型，對尚未獲得頭銜和名氣的女醫而言，反而替專業形象扣分，於是她常要求髮型設計師將她弄老一點，最好能「看起來夠老」。²⁸ 由此亦可理解為何女醫們在派對上方能精心打扮，背後也出自於社會對女醫在性別和年齡上的刻板印象。

映襯著喬伊絲無法突破職場天花板，李黎以金斯堡為核心，刻劃出一群身處高位的男醫、科學家的明爭暗鬥：邁可也因冒險進行人體實驗而被金斯堡警告，兩人產生嫌隙；懷特討好金斯堡，但發現自己未能被擢升為主任而懷恨在心，跳槽至另一家醫院，最後則藉「袋鼠計畫」的曝光反將金斯堡一軍，將小說最末的男性角力推向高潮。李黎設計金斯堡所驅動的性別和職場戰爭有其必要性，他的出現既構成「袋鼠男人」計畫執行的障礙，又同時推進敘事，增加戲劇張力。這

26 成令方，〈醫師專業的興起與發展及其性別政治〉，成令方主編，《醫療與社會共舞》（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8.02），頁 65、67。

27 林靜儀，〈「謝謝護士阿姨」〉，《診間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到生命的出口》（台北：鏡文學，2018.08），頁 45。

28 同註 27，頁 46。

群在醫療體系競逐的男性內鬥，似乎也潛藏著男性好戰的印象，如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觀點：「好戰卻是男人的習性，而不是女人的。」²⁹ 珍妮也持類似觀點，她發現施打女性賀爾蒙後的丈夫溫柔體貼，於是想像如果男性都能懷孕；或「也不必非懷孕不可，只要做一個月女人……這個世界也許就不會有什麼戰爭、核武、大屠殺這些問題了。」（《袋鼠男人》，頁 122）珍妮將戰爭、核武與大屠殺歸因於雄性賀爾蒙，加上金斯堡操縱的謀權之戰，看來正坐實了戰爭專屬於男性的立場。然而，這是否也落入了性別刻板印象？在珍妮與喬伊絲的互動過程中，李黎也埋下引人深思的伏筆。

雖然喬伊絲救回珍妮一命，但珍妮其實對聰明幹練、外表出眾的喬伊絲有所忌憚，因為她不僅是邁可的同事，更擁有珍妮沒有的「武器」——子宮，而珍妮的子宮又是喬伊絲切除的，情緒更加複雜。從珍妮一開始對喬伊絲有所忌憚；以及她對完美代理孕母油然而生的被威脅感，暗示了好戰驅力也隱藏在女性內心。不過，李黎並沒有順著珍妮的嫉妒而發展成宮鬥劇，反而安排兩人進入醫病關係中的「魔術時刻」：敞開自我、連結彼此、建立共感，達成的方式就是讓喬伊絲向珍妮坦承，自己失去子宮和婚姻的痛史，這不僅有效安撫了不安的珍妮，對方婚姻破裂的被剝奪感反倒令珍妮心生憐憫。傾訴，悄悄置換了醫病者的身分，又因涉及私密的創傷故事，更消弭彼此隔閡。不僅如此，喬伊絲引用一位女作家的話，注入更多「她者」的共感經驗：「在女人的身體上寫滿了這些傷痕：妊娠裂紋、子宮切除、剖腹取產、割除乳房」（《袋鼠男人》，頁 44）這位不知其名的女作家聲音，也共同參與了這段醫病關係，女作家、醫生和病者三位女性的聲音彼此交織，模糊了職業上的分際，召喚出女性共有的痛感經驗，亦由此顯示：當私人敘事流淌進醫療場域，便具緩和醫病關係的可能。

因此，當喬伊絲攤開個人生命史，化解了珍妮內心的嫉妒和敵意，她也才能看到女醫處境的艱難。雖然珍妮在邁可孕後益發成為「大女人」，但小說人物的

29 Virginia Woolf（維金尼亞·吳爾芙）著，王蕙真譯，《三枚金幣》（台北：天培文化公司，2001.09），頁 18。

塑造本應多元而立體，絕非單一、扁平。透過珍妮的目光，讀者得以審視醫療環境隱藏的男性中心思想，以及女醫職場經驗，因此珍妮一角，也折射出李黎對於醫療環境的反思。

四、媒體怪物與轉折英雄：《袋鼠男人》劇本中的性別議題

然而，上述對於女醫處境的反思，及醫病者相濡以沫的段落，在《袋鼠男人》劇本中是沒有的。小說出版後兩年，由劉怡明和李黎合作，³⁰ 拍成電影，受眾從讀者變成觀眾，將男性懷孕推向更廣大的公眾視野。這一節先對照「袋鼠男人」計畫中的孤立性與公眾性，分析小說暗藏的攝影細節之效用，再進一步探究《袋鼠男人》劇本如何改動小說細節，使其詭異地產生了與性別平等更遙遠的距離。

因涉及人體實驗禁令，「袋鼠男人」計畫從一開始就只限參與的四個成員知曉，是不能說的秘密，由此亦強化孕體的孤立性。再者，小說設計了與秘密相互衝突的元素——珍妮在新聞台工作，具有將私人消息帶入公眾的象徵性，因此計畫啟動後，珍妮便從電視台借來小型攝影機，並宣告：「我要把每一個步驟都拍攝下來，像做一套科教紀錄片一樣。」（《袋鼠男人》，頁 106）計畫中的重要程序，珍妮都參與影像記錄，然有趣的是，在邁可進行剖腹的「最後一哩路」，珍妮竟忘了帶攝影機，對此她惋惜：「最重大的高潮，竟然無法用影像記錄下來了！」（《袋鼠男人》，頁 218）彷彿沒有攝影機作為見證，事件便不存在，這似乎也反諷：面對邁可和胎兒存亡之秋，珍妮卻先懊悔沒帶攝影機，置身事外，延續著珍妮將記錄公眾的利器，挪用為「自媒體」的懷孕記錄神器，遂將小說導向最終的媒體狂熱。劇本中，導演省略了珍妮的影像記錄，但安插的一句話倒符合小說最後的媒體狂熱：當邁可解釋袋鼠計畫時，珍妮反駁：「我可不要孩子一生出來就變成一個媒體怪物」，³¹ 珍妮這句搶白，替新聞媒體瘋魔結局埋下伏筆的同時，也暗示著無風不起浪的媒體似乎才是「怪物」，但諷刺的是，珍妮也參

30 劉怡明出生於台灣，長年旅居美國，曾擔任李安《推手》的製片，獲得 UCLA 最佳女導演獎項。

31 李黎、劉怡明，《袋鼠男人——電影劇本與幕後人語》，頁 47。

與了製作媒體怪物的歷程。

「袋鼠計畫」從秘密躍升為新聞焦點，引來宗教、婦女、商人團體的關注，乍看之下孕體終於突破家屋，進入公眾視野，不過眾聲喧嘩的場面，反更增添孕體的孤立性：曾形容自己是「實驗囚徒」的邁可，再度困鎖於病房，被醫療儀器監控，動彈不得，意識未明，縮限在自己的身體裡，完完全全的「男主內」，同時，「女主外」正召開記者會，她娓娓道來失去子宮、夫妻倆渴望有孩子的心情令人動容，「記者刷刷記錄，知道這也可以寫成一篇情文並茂的專題報導」（《袋鼠男人》，頁 244）。這段文字不僅描繪了李黎對新聞生態的觀察，記者會更加凸顯了孕體不在場，無發言權，對照於大鳴大放的各路人馬，邁可所經歷的是一段無人知曉的暗黑時間（昏迷）與前歷史（懷孕的身心壓迫），媒體熱潮深化了孕體的孤立性。劇本雖不強調孕體孤立性，但也描繪了媒體亂象：甦醒後的邁可和懷抱嬰兒的珍妮，在病房收看記者拼湊真相的（假）新聞，以及記者的街頭訪問，其中的庶民觀點詼諧，亦可視為導演劉怡明對九〇年代美國媒體生態的反思。

小說中的喬伊絲，讓劉怡明聯想到自身從事電影工作的性別經驗，她表示，九〇年代電影工業仍由男性主宰，女性若要獲得肯定，「妳必須不斷地證明妳自己，才能讓別人聽到妳的聲音，去了解妳的 Vision——妳的理念和想像力。」³² 劉怡明的經驗亦可從其餘資料驗證：1978 年由美國加州諮詢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便指出，美國電影工作室身處決策的少數族群和女性少得可憐（女導演更少），即便到了 2009 年前，票房最高的一百部片中，僅有三成有台詞的演員是女性，紐約電影學院也發現女性在電影中的裸露頻率遠高於男性。³³ 雖能同理喬伊絲的處境，然受限於影片長度和娛樂效果，劇本中對女醫形象僅簡單著墨，甚至刪除其餘兩位女醫的角色，不僅如此，還展現了女醫的性別矛盾。

對比小說和劇本，無論是族群或性別議題，劇本多以幽默感加快敘事節奏，

32 同註 31，頁 161。

33 Andi Zeisler（安蒂·柴斯勒）著，周彥廷譯，《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在流行文化中被架空的社會運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2.05），頁 77。

以下舉例說明劇本對原著上的改寫，其中幾個情節詭異地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當邁可成功懷孕，劇本安插了彼得對邁可的調侃，他笑說邁可乳房逐漸膨脹，需要奶罩；當邁可抱怨兩個女人留下孕夫、擠在廚房燒菜時，彼得幫忙的同時也笑說：「讓那些女人去坐在電視機前面看體育節目、喝啤酒打飽嗝！」³⁴ 男人下廚而女性看體育節目、喝啤酒，完全複製了傳統的性別分工。接下來還有這番對話：

邁可：（英）好。……我的小腿肚上好像有靜脈瘤。

他拉起褲管，玫伊絲看了一下。

玫伊絲：（英）不算嚴重，可以穿雙綁腿襪。……好在你不是女人，不必在乎小腿的美觀。

彼得：（偷偷向珍妮，英）性別歧視！

玫伊絲聽見了，笑著白他一眼。

邁可：（英）還有，我臉上長了雀斑！

玫伊絲：（英）也是懷孕的副作用。

彼得（又偷偷對著珍妮，英）：「好在他不是女人，沒有人會看他的臉——只會看他的肚子！」³⁵

小說的這段對白設計略有不同，小說描述當喬伊絲說「好在他不是女人」時，戴維（彼得）回應：「哼！女人講大男人主義的話！」（《袋鼠男人》，頁 162）此外，喬伊絲解釋雀斑是懷孕副作用之後，那句由彼得對珍妮悄聲道的「不必在乎臉皮」的話，其實是喬伊絲想說但沒說出口的話，反映了喬伊絲也認同女性才需要在乎外貌，這又折射出社會對女性外表的凝視。關於這點，李黎在劇本和小說中，皆透過另一個角色指正這是「性別歧視」和「大男人主義」，似乎由他人

34 同註 31，頁 95。此外，劇本中的彼得，即是小說中的戴維，玫伊絲則是小說中的喬伊絲，以下段落的引用和人名，皆依劇本和小說的命名，不再另加說明。

35 同註 31，頁 97。

的自覺（即使是開玩笑口吻），這個被「指正」出來的性別偏見，便能緩解關係緊張，製造某種「樂趣」。然而，上述引文值得深思的，還有那句「女性得費心維護其外貌」，實出自於一位女醫之口，反映其內在矛盾：為符合病患及家屬對女醫專業的刻板印象，喬伊絲刻意隱藏美艷外貌，但她又在聊笑間認同女性就該注重外貌。再者，沒有人會在意孕體的臉和體態，又再次強化孕婦被期待的「去性化」的社會腳本，延續這個觀點，劇本繼續加碼強化刻板印象，凸顯孕夫對於外貌的自卑與失落。劇本安插了兩個小說沒有的段落：在編號 86 場中，珍妮正替男模拍照，僅著泳褲的男性健美，前來探班的邁可看了自己的孕肚後黯然離開；87 場裡，邁可向彼得透露擔心珍妮會愛上別的美男子，而被拋棄。電影發展至此，閨怨孕夫已生出「棄婦」恐懼，下一個鏡頭便切到性慾高昂的邁可費心營造氣氛，但因孕肚過大，無法「喬」妥性愛姿勢而作罷，下一幕便是珍妮呼呼大睡，孕夫輾轉反側——又是一個「離奇」的傳統性別角色複製。³⁶

胎兒的性別在小說和劇本也有不同。劇本描述邁可產下女嬰，在小說中則非懷男胎不可，因為珍妮的兄弟罹有遺傳性的杜欽式肌肉萎縮症，若懷男嬰，罹患家族罕見疾病的機率大增，於是邁可將未獲人體實驗證明的基因培養液，悄悄注入胚胎盤。李黎認為這是故事主線之一，但她擔心沒有「戲」——意味著這個細節的故事性不強，又有醫療專名，基因變異和醫療技術恐不適合娛樂片，因此這段異常基因的段落便兩度遭刪除。³⁷ 然從敘事技藝來看，這個段落既符合邁可愛冒險的設定，也更能凸顯懷孕的孤立性：這是一個唯有他才知道的秘密，若不成功，即使產下男嬰也仍帶有殘病基因。雖然劉怡明很喜歡這個段落，而試圖保留進第二版中，但考量到影片長度和製作成本，最後仍被刪除。筆者以為，這其實能充分傳遞劉怡明所謂的「轉折的英雄」（a hero with a twist）觀點：劉解釋，相較於好萊塢電影拯救弱女子的典型英雄（迷思），邁可親身體驗了女性孕育生

36 劇本中附上劇照，並說明：「邁可和珍妮的小『愛巢』——不過妻子呼呼大睡、孕『夫』輾轉反側，情調有點離奇。」同註 31，頁 101。

37 李黎、劉怡明，《袋鼠男人——電影劇本與幕後人語》，頁 17。

命產生的「無力」過程，李黎則進一步針對「無力」延伸說明，認為女性被視為無力的弱者，乃是她經歷了懷孕、生產和哺乳這些女性最無力也無助的時刻，但又弔詭地展現了自然最強悍的生命延續力，既是弱者又是強者的形象，正詮釋了英雄的兩面性，而劉怡明也希望能以「轉折英雄」的形象，為好萊塢電影工業提供不同的英雄版本。然而，這點在劇本中並未細緻鋪陳，除了刪除邁可冒險拯救變異基因的行為，還讓邁可成為健美男模的對照組，無形中淪為怨夫甚至棄夫，因此，筆者懷疑，這些改動僅能讓觀眾看到一個無力（無用？）改變現狀的孕體，這樣的形象要如何連結「轉折英雄」？似乎缺乏更多細節支撐。

因此，雖然劉怡明試圖在市場需求和女性觀點間取得平衡，某些角色的設定仍不自覺暴露了性別刻板印象，如男扮女裝的保母范代克，又如邁可李的母親。廚藝精湛的李母在小說中描述不多，僅作為一個遙遠而傳統的中國典型婦女符號，導演劉怡明則給李母更多戲份，她形容李母喜感、充滿好奇心、有母性關懷又天真爛漫，不過值得推敲的是，在小說中模糊象徵中國飲食文化的李母，在電影中卻以中國廚娘的刻板形象出現，甚至誇大了廚娘的娛樂性：為了替孕婦滋補，李母上演捉活雞、內臟燉湯等野蠻中國食譜的戲碼，似乎也順應著西方人的中國想像。因此，雖劉怡明自稱「絕對是女性主義者」，劇組人員也以女性居多，然受限於電影整體的娛樂氛圍和市場考量，女醫處境不但沒有充分發揮，反而凸顯了喬伊絲潛在的女性焦慮，李母的塑造也奇詭地對了西方人「中國廚娘」的胃口，而注入女性荷爾蒙的邁可，確實展現了孕體的無力，但他無力改變的怨夫和棄夫心態，要如何變身為「轉折英雄」，中間仍有太多論述空隙。

五、對讀李黎的悼亡書寫與《袋鼠男人》

李黎表示，《袋鼠男人》是她的寫作經驗的「異數」，因為「在形式和關注對象上相當不同於我其他的作品。」（《袋鼠男人》，頁2）從形式上看，李黎先前的作品以散文、中短篇小說為主，《袋鼠男人》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以角色觀之，李黎初次描寫科學家和醫療人員，也有別於奚密對李黎過去小說中男

性菁英的分析：「痛苦地意識到自我個體的衝突與對立，但又無力改變現狀。」³⁸邁可的能動性則突破了過去乏力改變現狀的男性菁英。再者，李黎早期小說多為悲劇收場，奚密分析她七、八〇年代的小說，指出李黎「拒絕以大團圓來為人類經歷的基本衝突——亦即自我和外在世界之間的衝突——提供虛偽的結局。」³⁹因此《袋鼠男人》最末一家團圓的場景，也是她寫作小說的異數。筆者以為，這個結局反應了她在經歷喪子痛苦後，體現在寫作的變化，這可從《悲懷書簡》推敲原因，因此，這一節簡要對照《悲懷書簡》與《袋鼠男人》的情節，也以潔西卡·勞頓（Jessica Lourey）「小說改寫人生」之觀點，試圖提出與過去論者不同的看法，本文想指出：從寫小說用以撫慰傷痛的這點來看，小說《袋鼠男人》不亞於散文《悲懷書簡》。

動筆撰寫《袋鼠男人》的1990年，李黎不僅出版了懷念亡兒的《悲懷書簡》，也再次修訂《美麗新世界》譯本，二者皆有助於觀察李黎寫作上的延續和變化，亦可看出《袋鼠男人》不全是她寫作的「異數」。李黎在受訪中表示《悲懷書簡》是她生命中「書寫精神的分界線」，⁴⁰此書收入了四封分別寫給兒童心臟專科弗瑞德·雪曼醫師、兒子的幼年同伴黎明，以及李黎的友人三毛、東妮的信。寫給雪曼醫師的信中，李黎細緻解釋了兒子的死因源於心臟血管過於細而彎，兒子因罕病而猝死的經驗，也移植到《袋鼠男人》中的家族遺傳罕病：杜欽氏肌肉萎縮症。有別於兒子從未被檢查出罕病；一發病便無法挽救的致命結局，小說中的罕病不僅一開始就被發現，邁可大膽地將未經人體驗證的培養液注入胚胎一舉，便從源頭予以矯正，最終不僅胎兒健康，更讓異常基因於家族史中滅絕，後代子孫都不再受此威脅，透露了李黎改寫現實版本的期盼。因此，罕病的設計除了為小說增加複雜性，可強化邁可「轉折英雄」的特質，更展現了小說改寫的敘事力：對照於李黎痛失愛兒的經歷，虛構小說提供了另一種無從也無法經驗的版本，這

38 奚密，〈自我衝突與救贖意義：李黎小說研究〉，《中外文學》18卷5期，頁48。

39 同註38，頁49。

40 許劍橋，〈寫家書的人——李黎的創作心路〉，《文訊》290期（2009.12），頁38。

便是潔西卡·勞頓 (Jessica Lourey) 所謂寫小說的力量，她認為不同於紀實自傳，書寫虛構故事能與自身拉開距離，旁觀自己的困境，並以小說《心火》裡瑞秋的回答，說明小說改寫人生的力量：「如果我講的是故事，內容完全由我控制……如果我講的是故事，感覺就沒那麼心痛；如果我講的是故事，我就能忍受這件事」正因為是故事，便能在現實的基礎上，依照作者喜好、敘事需求而更改、虛構情節，由此產生了改寫的力量，潔西卡·勞頓因此稱這種改寫為「轉化痛苦的煉金術」。⁴¹ 她引用並轉化大腦科學研究對於改寫生命故事的敘事力：「我正讓這個故事具體成形，讓自己習慣這個故事，將深沉的悲痛化為經過控制的小劑量，一次一點，讓自己逐漸免疫。」⁴² 筆者欲以潔西卡「小說改寫生命」的觀點，來看《袋鼠男人》中罕病被發現進而治癒的情節，李黎讓男女主角的兒子遺傳了家族罕病，卻能在胚胎期就被矯正，藉此讓李黎獲得改寫的主控權，這種貼近現實卻又能虛構情節的改寫，正是「轉化痛苦的煉金術」。對照於散文《悲懷書簡》，李黎只能在兒子已死的現實中，試圖以人生哲理自我說服，尋求超脫的可能。⁴³ 從這個角度亦可理解，為何《袋鼠男人》的劇本是全家團圓的喜劇，小說末尾也透露了邁可即將甦醒的希望感。總之，小說和劇本都在經歷了衝突與困難後團圓，圓滿的結局或可彌補李黎對現實中的重大失落。有別於薛人望和論者認為李黎藉由寫作《悲懷書簡》自我療癒，筆者以為《袋鼠男人》是虛構文本，深具改寫和主控的力量，不僅如此，因為敘事距離更遠的小說，更能帶自身飛越泥沼。

其次，《悲懷書簡》亦可對照《袋鼠男人》中對於生死和醫療的省思。李黎表示男人懷孕的故事構思了一段時間，突然中斷的原因正是兒子猝死，經歷修復期後重拾此故事，新感觸油然而生，包括「對生命的終始、人力所能逮的極限等

41 Jessica Lourey (潔西卡·勞頓)，張怡沁譯，《改寫你的人生劇本》(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8.04)，頁 63。

42 同註 41，頁 61。

43 當李黎一遍一遍地向他人訴說兒子的意外時，突然意識到自己就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赫然領悟「一個人悲哀是自己的事」，世界仍照常運轉，她必須從痛苦中超脫。這樣的表達方式，就是李黎試圖透過文學、哲理進行自我說服和撫慰。李黎，《悲懷書簡》(台北：爾雅出版社，1990.11)，頁 34。

等的思考；而已不僅只是原先的探討男女角色關係和功能（包括生物和社會層次）的主題了。」（《袋鼠男人》，頁2）所謂「對生命的終始」、「人力所能逮的極限」乍看抽象，但若參酌《悲懷書簡》中的生死懷思，及醫療在面對罕病能提供的有限輔助便不難理解。從寫作時序來看，男性懷孕的構想及故事完成之間，夾著李黎痛失愛兒的重擊，不僅如此，故事中斷和重拾故事皆源於兒子亡故，因此，這個艱難創造生命的故事，背後緊密連結死亡，如同她在〈生日〉一文對生與死的連結：她先描述生產如「小規模的死亡經驗」，又因兒子猝死，文末總結了生日乃「悲劇誕生之日」，⁴⁴在生日與死亡、悲劇誕生的首尾間，她細數兒子在13年的生日景況，亡兒又藉由細寫，彷彿在筆尖重新誕生。

其次，延續著生命終始，再看李黎所謂的「人力所能逮的極限」。筆者以為，這反應了李黎對生育醫療技術的反思，這點也可參看《晴天筆記》。兒子離世五年，《晴天筆記》同樣以書簡寫給上述四位友人，其中一位收信人三毛已離世，因此李黎解釋有些信件並無寄達、也不在意收信人能否讀到，而是設定一個熟知事件的對象，以彼此共有的記憶為基礎，盡情暢快地發抒感受。在寫給三毛的信中，李黎表示曾對三毛的神秘經驗存疑，甚至批評「對無法解釋的現象，不去蒐求科學答案，而附會以神秘主義的虛誕之說，是知識上的懶惰」。⁴⁵但她筆鋒一轉，形容自己開始對神秘經驗敬畏；並質疑過去深信不已的醫療科技，來自於她高齡懷孕的過程。李黎在書中細數如何借助繁多的醫學科技手段——接通已結紮的輸卵管，外用與內服藥、賀爾蒙注射、超音波體內探測、定時抽血等——懷孕，然而，即使在長達四年的密集醫學監控下，進行多次試管嬰兒實驗，卻屢屢失敗，正當決定放棄，塔羅牌測出她還會有一個孩子，難以置信之餘竟自然懷孕，因此對於神秘經驗和醫療科技的觀點開始有所變化，這即是她所謂的「人力所能逮的極限」。

正當她嘗試各種技術仍受孕失敗，讓她想到了《袋鼠男人》：「當時寫著書

44 同註 43，頁 136。

45 李黎，《晴天筆記》（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09），頁 24。

中那對夫妻因不孕而經歷的痛苦，萬萬沒有料到自己會親嚐一遍。生活如此模仿藝術，思之令人悚然。」⁴⁶從《晴天筆記》這段感嘆中，李黎體會了《袋鼠男人》這對夫妻之苦，與其說這是生活高度模仿藝術，筆者傾向從「人力所能逮的極限」觀點，來看李黎對於醫療科技的反思：《袋鼠男人》中讓男性懷孕的醫療技術在理論上可行，邁可也親身實踐，然如前文所述，醫療科技的進步並沒有如願兌換男女平權的理想國，男性懷孕也並非女性的福音或終極救贖，懷孕過程中因情緒波動和體態變形所產生的孤立性，並非醫療可解決的問題，單靠醫療科技，是無法允諾一個美麗新世界。

六、結語：美麗新世界？從醫療想像到反思

李黎認為《袋鼠男人》是她寫作經驗中「異數」，但她又認為，若從翻譯《美麗新世界》的經驗來看，會寫男性懷孕並不奇怪。《美麗新世界》是1969年李黎以黎陽為筆名所翻譯的小說，而撰寫《袋鼠男人》的1990年，她又再次對照原文，重新修訂。設定在2540年倫敦的《美麗新世界》，開頭便以「倫敦孵育暨制約中心」為起始，描述科學家大規模地培植試管嬰兒計畫，為了「共有、劃一、安定」的世界和平理念而設置的人類孵育計畫，實際上卻潛伏著諸種危機。如同李黎認為作者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預見「當人文意識薄弱、而行政控制強有力時，結合上優越的科技文明，將會是一個巨大的人類夢魘的開始」。⁴⁷

李黎年輕時曾沉緬於烏托邦的追尋，中年歷經無常，以為現實中更多的是烏托邦的反例，尤其當李黎接受高齡懷孕的諸種療程並飽嘗挫敗之餘，體會到「人力所能逮的極限」，筆者認為這句話可和薛人望認為《袋鼠男人》「將懷孕的可能推到極限」對照，兩者雖都使用了「極限」兩字，意涵卻大不相同：相較於後

46 同註 45，頁 32。

47 李黎，〈修訂版譯者序言〉，Aldous Leonard Huxley（阿道斯·赫胥黎）著，李黎、薛人望譯，《美麗新世界》（台北：志文出版社，2001.05），頁 6。

者崇尚科技，認為醫療技術能最大程度地協助人類繁衍，前者則感慨即使生殖醫療技術再如何先進，面對神祕的生死議題，能發揮的效用也相當有限。因此，若將《袋鼠男人》放在李黎的寫作脈絡來看，並對照同時期寫作的《悲懷書簡》、《晴天筆記》，不難發現李黎對醫療科技經歷了堅信、仰賴、懷疑到反思階段，亦可視為從追尋烏托邦到懷疑烏托邦的歷程，由此可見，醫療想像所引發的性別矛盾，其實彰顯出過去對醫學科技深信不已的李黎，對烏托邦般的醫療技術有了不同觀點。由此可見，《袋鼠男人》中雖以「將袋子縫進男性身體」的醫療理論出發，以醫療專名和流程細緻地解釋了男性懷孕在理論上可行，但在「袋鼠計畫」啟動時，李黎卻有意刻畫珍妮面對丈夫代勞懷孕的提議，而混淆了身體性慾、社會性別角色，甚至當邁可順利懷孕，男主外而女主內的樣板被複製，只不過將傳統男女角色對調而已，然而，角色的塑造本就應豐富多面貌，李黎同時藉由珍妮的視角，反觀女醫在男性主導的醫療環境中的艱難處境。

與其說這本小說貫徹了性別平權的美好終局，筆者以為《袋鼠男人》倒是前後一致表述了孕體的孤立狀態，當獨屬於女性的懷孕能力由男性擔當時，強化了一向被視為靜態的、去性化的懷孕狀態，因為男主外的邁可之能動性，大大衝擊了靜態的孕體形象，並藉由男性懷孕的不可說，強化了居家孕體的孤立性，而要突圍的方式，就是邁可得表現出更顯著的不受控，讓瘋狂行徑進入公眾視野，進而迎來小說最末的媒體狂潮。整個「袋鼠計畫」的執行過程著實充溢著動態感與展演性，無論是小說角色關於身體、性慾、性別分工的混淆不清，還是因性別混淆而開的玩笑，其中的細節不僅隱含了李黎的批判性思考，同時也彷彿對薛人望「將懷孕的可能推到極限」觀點的最大反諷，因為男性懷孕確實讓懷孕的可能被推到極限，但由此反而暴露了小說角色的性別矛盾。接著，本文從小說最末進入公眾視野、成為媒體熱議焦點的男性懷孕，更進一步探究進入影視產業後的敘事異動。相較於小說的角色和情節設定，電影劇本在時間有限且考量成本的狀態下，更需強化戲劇性，因此即便諸多細節聚焦於男性懷孕對角色的衝擊和挑戰，但無形中卻更鞏固了傳統的性別分類，雖然導演劉怡明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但電

影劇本中不乏建立在性別刻板印象上的娛樂笑點，而她從女醫處境看到女導演困局的同理；以及她對邁可成為「轉折英雄」的期待，似乎也無法在電影中充分發揮，甚為可惜。

由此可見，讓男性代替女性懷孕的（夢幻）科技，無法達成性別平權的「美麗新世界」，醫療的進步想像，若仍搭配舊有的性別刻板印象，即使男女易位，也僅製造出更多忙於事業的「大女人」和深閨怨「夫」，並無太多新意。《袋鼠男人》透過男性懷孕的醫療想像，暴露出更多性別矛盾，而這些性別矛盾，又暗示了李黎對於醫療科技與生命終始的反思。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王鈺婷主編，《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10）。
- 成令方主編，《醫療與社會共舞》（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8.02）。
- 李黎，《袋鼠男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2.03）。
- ，《悲懷書簡》（台北：爾雅出版社，1990.11）。
- ，《晴天筆記》（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09）。
- 、劉怡明，《袋鼠男人：電影劇本與幕後人語》（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4.12）。
- 周芬伶著，陳義芝主編，《新世紀散文家：周芬伶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公司，2002.07）。
- 林靜儀，《診間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到生命的出口》（台北：鏡文學，2018.08）。
-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7.09）。
-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03）。
- 張曉風，《曉風散文集》（台北：財團法人道聲出版社，1993.03）。
- 張讓，《斷水的人》（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03）。
- 梅家玲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10）。
- 鍾慧玲主編，《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台北：里仁書局，1997.04）。
- 簡嬪，《紅嬰仔：一個女人與她的育嬰史》（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05）。
- 蘇芊玲，《不再模範的母親》（台北：女書文化公司，1996.05）。
- Aldous Leonard Huxley（阿道斯·赫胥黎）著，李黎、薛人望譯，《美麗新世界》（台北：志文出版社，2001.05）。
- Andi Zeisler（安蒂·柴斯勒）著，周彧廷譯，《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在流行文化中架空的社會運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2.05）。
- Iris Marion Young（艾莉斯·馬利雍·楊）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

身體經驗》（台北：商周出版公司，2007.01）。

Jessica Lourey（潔西卡·勞頓），張怡沁譯，《改寫你的人生劇本》（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8.04）。

Meghan Daum（梅根·達姆）編，于是譯，《為什麼我們不想生：生與不生，哪一種人生選擇更幸福？》（台北：二十張出版，2022.12）。

Nancy J. Chodorow 著，張君玫譯，《母職的再生產：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3.10）。

Virginia Woolf（維金尼亞·吳爾芙）著，王蕺真譯，《三枚金幣》（台北：天培文化公司，2001.09）。

二、論文

（一）期刊

李欣倫，〈神話之外的真實女人：《斷水的人》中的母親形象反思與辯證〉，《中國現代文學》44期（2023.12），頁29-50。

沈靜茹，〈醫師職涯中的性別迷思〉，《台灣醫學》22卷4期（2018.07），頁419-421。

林韻文，〈浮世逆旅：李黎旅行書寫的主題建構與風景鏡像〉，《嘉大中文學報》3期（2010.03），頁115-148。

奚密，〈自我衝突與救贖意義：李黎小說研究〉，《中外文學》18卷5期（1989.10），頁45-66。

許劍橋，〈寫家書的人——李黎的創作心路〉，《文訊》290期（2009.12），頁38-40。

陳必芬，〈尋找烏托邦——李黎《西江月》中的集體救贖〉，《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9輯（2011.12），頁63-81。

潘雅鈴，〈臺灣自主性母職書寫的多面向——以李黎、龍應台、簡媜為例〉，《南台學報》37卷4期（2012.12），頁89-103。

薛人望，〈李黎與「袋鼠男人」〉，《聯合文學》8卷5期（1992.03），頁106-112。

（二）學位論文

李麗芬，〈在《浮生》中尋找——李黎散文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2006）。

侯俐雅，〈李黎小說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陳之婷，〈雨過天晴，生生不息——李黎《晴天筆記》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

熊家艷，〈李黎散文的追憶書寫〉（台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19）。

潘純菁，〈李黎旅行散文研究〉（台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10）。

蘇婉如，〈流亡與回歸：論李黎和洪素麗的家族書寫〉（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9）。

